

柯麟早年滬港澳活動新探

黃文輝

[摘要] 澳門鏡湖醫院首任院長柯麟長年在港澳從事地下工作，其生平具傳奇色彩。本文以柯麟回憶錄及新發現的期刊、報章文獻，梳理柯麟在進入鏡湖醫院工作前、在滬港澳三地的醫學及社會活動經歷。經考證，1921–26年間，柯麟在廣東公醫醫科大學學習，畢業後在廣州博濟醫院工作。1929年柯麟在上海以原名柯輝萼申領醫師證，申報地址為上海著名的五洲藥房樓上。1930年12月柯麟到香港，翌年在深水埗區開設南華藥房，結識同為海豐縣的同鄉張若伯，且在張氏主編的《南星雜誌》上刊登廣告，披露了柯麟在港行醫的吉光片羽。1936年6–9月，柯麟移居到澳。隨着抗日戰爭爆發，柯麟在澳門組織“澳門華僑協會”，該協會有可能是中共在澳門的地下機關或外圍組織。此期間，柯麟積極參與澳門各項社會公益、慈善救濟活動。

[關鍵詞] 柯麟 鏡湖醫院 南星雜誌 澳門華僑協會

柯麟（1901–91），原名柯輝萼，1901年出生於廣東海豐，是著名的醫生、醫院管理者以及醫學教育家，歷任澳門鏡湖醫院首任院長、^①廣州中山醫學院院長。^②柯麟也是共產黨員，長年在港澳從事地下工作，其生平因而具傳奇色彩，被稱為“紅色醫生”。現有的柯麟傳記或論文，^③大都圍繞其革命工作、社會活動方面；即便談及其在鏡湖醫院的工作，也是泛泛而論，未有具體從醫療史的角度來理解柯麟的貢獻。同時，大部分與柯麟相關的

作者簡介：黃文輝，澳門科技大學歷史學博士。

^①柯麟帶領鏡湖醫院成功轉型為現代化醫療機構，在其領導之下，鏡湖醫院“在行政上組織院務會議，集思廣益，實行民主管理；在醫務上增聘醫師，分設內科、外科、兒科、婦產科，擴大醫療範圍，提高醫療效果；在院舍方面，則在鏡湖馬路新建一個門樓紀念孫中山先生，門樓至留醫所之間築一條通道，方便病人出入的（接）送”；“一個擁有四科、三室，三百多病床的稍具規模的醫院在三、兩年間創立起來”。見退休老職工：〈鏡湖醫院史話（一）〉，《華僑報》（澳門），1982年11月4日，版3。

^②關於中山醫學院的發展變遷，參看戴弘、陳偉林：〈春風化雨逾百年——中山醫科大學校史簡介〉，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山醫科大學主編：《醫林群英——廣東著名醫學家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11；關於柯麟在中山醫學院的工作，參看魯陽、卓大宏、南草、梁芝瑗：《柯麟傳》，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1993年，頁121–64。

^③現時柯麟的傳記主要有兩本：魯陽、卓大宏、南草、梁芝瑗：《柯麟傳》，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1993年；鄭偉聰：《柯麟的港澳歲月（修訂本）》，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2019年。主要的介紹性文章有吳躍農：〈柯麟在澳門〉，《老年人》（長沙），第12期，1999年，頁22–24；魯陽、梁芝瑗：〈緬懷紅色醫生、醫學教育家柯麟〉，《源流》（廣州），第12期，2001年，頁48–50；穆欣：〈一代名醫柯麟的傳奇生涯〉，《世紀》（上海），第4期，2002年，頁26–30；吳躍農：〈柯麟——一位特殊的醫生在澳門〉，《黨史縱覽》（合肥），第4期，2005年，頁41–44；劉李雲：〈柯麟——中山醫之魂〉，《中山大學學報》（廣州），第6期，2010年，頁913；許禮平：〈神醫柯麟〉，《舊日風雲·二集》，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頁38–42；許禮平：〈續說神醫柯麟〉，《舊日風雲·二集》，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頁43–50；沈曉濤：〈大醫柯麟：“高懸義壺濟貧苦”〉，《同舟共進》（廣州），第2期，2021年，頁60–63。論文有夏泉、劉詩悅：〈柯麟研究的現狀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第3期，2015年，頁128–32；夏泉：〈試論“活菩薩柯麟”柯麟的醫學生涯與成就〉，《澳門研究》（澳門），第2期，2021年，頁6–12。

文章或著作，以介紹為主，資料重複，千人一面，少有史料的挖掘與分析。^①本文將以柯麟回憶錄及新找到的期刊、報章文獻，梳理柯麟在進入鏡湖醫院工作前、在滬港澳三地的醫學及社會活動經歷，^②以期為還原這位紅色醫生的傳奇一生添磚加瓦。

一、早年醫學經歷

柯麟於 1921 年進入廣東公醫醫科大學學習。^③據 1916 年畢業於廣東公醫、後又於 1921–23 年間代任該校校長的黎鐸醫生表示：1921 年 8 月廣東公醫改名為公醫醫科大學，總稱為“公醫校院”，“招收柯輝萼（後改名柯麟）等新生一班，改學制為六年”。^④該校原名廣東公醫學堂，由省港紳商學各界創辦於宣統二年（1909 年）。1917 年改訂學制，本科修業期限五年，前四年學習，最後一年進入附屬醫院實習。^⑤在廣東公醫學習期間，柯麟積極投身學生運動，並加入共青團的外圍組織新學生社；^⑥到 1926 年，柯麟已任醫學院黨支部書記兼青年團支部書記。^⑦

1926 年 6 月，柯麟畢業於廣東大學醫科學院。1933 年《全國登記醫師名錄》載錄：“柯輝萼，男，廣東大學醫科，民 15 年 6 月，上海老靶子路五洲藥房樓上，醫 323”。^⑧此因

^①關於柯麟研究的現狀及不足，參看夏泉、劉詩悅：〈柯麟研究的現狀與展望〉，《澳門研究》（澳門），第 3 期，2015 年，頁 128–32。

^②目前關於柯麟在鏡湖醫院工作，未有具體從醫療史的角度來理解柯麟的貢獻，筆者擬另文討論柯麟對鏡湖醫院醫療發展的貢獻。關於柯麟與鏡湖醫院，參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01 年，頁 227–30；吳培娟、柯征、吳潤生、姚豐、吳偉樂等主編：《丹心照鏡湖：柯麟院長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 年。

^③據柯麟回憶，1920 年陳獨秀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命令各私立學校增設公費生名額，他於該年以公費生資格考入廣東公醫。柯麟：〈參加革命運動的回憶〉，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廣東黨史資料》（第 21 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2。柯麟此處記憶應該有誤。陳獨秀是 1920 年 12 月 29 日才到達廣州的，故不可能在 1920 年的學年度作出增設公費生名額的命令。見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1879–194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35。陳獨秀在廣州出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時間只有 9 個月，期間未見有作出增設公費生名額之舉。參看劉娟：〈陳獨秀在廣東革新教育活動探微〉，《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學報》（廣州），第 6 期，2017 年，頁 12–16；劉第紅、廖宇紅：〈陳獨秀在廣東的教育改革及其啟示〉，《高教探索》（廣州），第 7 期，2021 年，頁 116–21。1918 年，時任廣東省長翟汪以公醫學校辦理有成績，下令由省庫出資設立 20 名免費學額，翌年起實行。柯麟考取的公費生學額應屬此。見《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史》編委會編著：《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史（1910–2010）》，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4。按，現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前身即為廣東公醫。

^④黎鐸：〈廣東公醫醫學專門學校及附設公醫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廣州文史資料》（第 21 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171。黎鐸說公醫於 1921 年改學制為六年制，應該有誤。因後文可見柯麟是 1921 年入學，1926 年畢業，前後肄業 5 年。另，1926 年廣東大學醫科學院課程表，本科課程也是 4 年，再加一年實習。見〈本校醫科學院課程表〉，《國立廣東大學週刊》（廣州），總第 42 期，1926 年，頁 4。

^⑤佚名：〈國立廣東大學醫科學院史略〉，《國立廣東大學週刊》（廣州），總第 28 期，1925 年，頁 6；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纂：《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指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年，頁 37–38。參看《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史》編委會編著：《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史（1910–2010）》，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9。

^⑥柯麟：〈參加革命運動的回憶〉，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廣東黨史資料》（第 21 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6。關於“新學生社”，參看陳志文：〈大革命時期的廣州學生運動〉，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主編：《廣東青年運動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60–81。陳志文謂 1924 年公醫學生要求撤換教師鄧真得（德）事件上，“公醫‘新學生社’支部成員蘇家驥、柯輝萼（即柯麟）、盧福懋等與各班學生代表組成罷課鬥爭的核心”。見該文頁 74。

^⑦柯麟：〈李碩勳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戰鬥〉，《革命史資料》編輯部主編：《革命史資料》（第 17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頁 26。

^⑧內政部衛生署：《全國登記醫師名錄》，南京：內政部衛生署，1933 年，頁 27。

為廣東公醫醫科大學於1925年8月16日經省政府訓令，由廣東大學接收，改稱“國立廣東大學醫科學院”，^①故柯麟入學與畢業的學校名稱不同。

此《全國登記醫師名錄》所載的柯麟地址在上海，是由於柯麟在上海申領醫師證。上海《民國日報》1929年9月25日報道：“自衛部頒定醫師藥師及助產士暫行條例後，本埠醫師藥師及助產士均紛紛向市衛生局報告，請領部證”。^②據該報道，柯麟是上海市首批“准發醫師證書一百十一人”之一，登記名字是“柯輝萼”。所以，在1933年的《全國醫師名錄》中，柯麟的登記地址是上海，其醫師證編號是“醫323”。

據柯麟自述，他1927年4月15日在博濟醫院工作，幸而躲過國民黨搜捕共產黨員的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五事變”），^③也就是說柯麟於廣東公醫畢業後可能進入博濟醫院做醫生，但具體時間不清楚。^④4月20日後，柯麟輾轉經香港到武漢，經介紹進入葉挺屬下教導大隊當軍醫，一個月後被調任第四軍醫務主任。後隨第四軍返回廣州，在第四軍第三病院工作。1927年12月中，廣州起義失敗，柯麟撤退到香港，與葉劍英在大埔墟住了八個多月。^⑤

1928年，柯麟奉黨中央指示到上海，改名柯達文，與賀誠（又名賀雨生）在四川路合作開辦達生醫院；“達生醫院”乃各取柯達文與賀雨生之名一字而成。^⑥1929年，柯麟稱“在上海北四川路辦五洲藥店，兼做醫生，掛牌是柯達文醫生”，^⑦柯麟是以醫生身份做掩護，擔任上海地下黨組織的交通員。前已述及柯麟是1929年在上海登記醫師執照，其登記地址為“上海老靶子路五洲藥房樓上”。五洲藥房全稱五洲大藥房，是當年中國西藥企業巨

^①佚名：〈國立廣東大學醫科學院史略〉，《國立廣東大學週刊》（廣州），總第28期，1925年，頁7。關於廣東公醫與廣東大學合併的經過，參看非岳：〈公醫歸併廣大運動的經過和我們所得的教訓〉，廣東大學醫科：《廣大醫科周年紀念號》，廣州：人民印務局[承印者]，1926年，頁6-16。又，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廣東大學於1926年8月起改校名為中山大學，見〈限期實現中山大學〉，《國立廣東大學週刊》（廣州），總第59期，1926年，頁4。參看《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史》編委會編著：《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史（1910-2010）》，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8-11。

^②〈衛生部頒發醫師部證〉，《民國日報》（上海），1929年9月25日，第三張第二版。南京國民政府於1929年2月1日出版的《衛生公報》上刊登《醫師暫行條例》，見《衛生公報》，第2期，1929年，“法規”頁2-6。民國時期的醫師登記註冊過程波折重重，詳情參看尹倩：《民國時期的醫師群體研究（1912-1937）：以上海為討論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87-106；上海地區的具體實施情況參看該書頁106-16。

^③柯麟：〈參加革命運動的回憶〉，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廣東黨史資料》（第21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6。

^④有說柯麟畢業後在廣東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見魯陽、卓大宏、南草、梁芝瑗：《柯麟傳》，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1993年，頁36。博濟醫院由傳教士開辦，到1953年才併入為華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博濟醫院與廣東大學（後中山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其時為兩間不同醫院。參看陳小卡、王斌編著：《中國近代西醫緣起與中山大學醫科起源》，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

^⑤柯麟：〈早年參加學生運動的回憶〉，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主編：《廣東青年運動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7。

^⑥柯麟：〈回憶彭湃〉，劉林松、蔡洛主編：《回憶彭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14。達生醫院的名字，柯麟回憶錄的訪談者誤作“德星醫院”及“達勝醫院”，分別見柯麟：〈參加革命運動的回憶〉，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廣東黨史資料》（第21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7；柯麟：〈李碩勳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戰鬥〉，《革命史資料》編輯部主編：《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27。

^⑦柯麟：〈李碩勳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戰鬥〉，《革命史資料》編輯部主編：《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27。在另一篇回憶錄中，載柯麟開的是“五洲診所”，有可能是訪談者誤記，見柯麟：〈早年參加學生運動的回憶〉，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主編：《廣東青年運動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8。

肇，業務多樣，經營藥房外又自研西藥，分店遍佈全國，產品遠銷東南亞。^①五洲大藥房老靶子路分店是該公司在上海的第二個分店，於1928年8月16日開幕。當年報章載：

五洲大藥房自創備以來二十餘年營業日漸發達，……在國內外分設支店，已有九十餘處之多，而本埠五方雜處，生意尤為發達，除在天后宮橋已設第一支店外，茲為便利國客起見，復於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轉角，添設第二支店，特聘留學專門畢業，或臨診有年、醫理邃深、經驗宏富之男女名醫瞿直甫……諸醫師，常川設診，並不分晝夜，代配醫生方劑……^②

北四川路與老靶子路（今武進路）犄角相連，五洲大藥房分店正位於轉角交界處。此店特點是有醫生駐診，患者看完病就可以拿處方到藥房買藥，可見經營者是“一條龍”服務。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柯麟申領醫師證時填報的地址，就是這家五洲大藥房分店。至於柯麟是應聘在店裏駐診，還是在藥房樓上另租房子做診所，有待進一步考證。

二、《南星雜誌》所記柯麟在香港醫務與文章

1930年12月，根據指示，柯麟到香港找弟弟柯正平，要到一千多港幣，在深水埗開設“南華藥房”。^③當時香港有一個天主教徒張若伯（若伯是他的聖名），跟柯麟一樣也是海豐人。他1927年底逃避兵亂到港，獲主教收留，在深水埗創辦“研道所”以聯絡教友；^④後於1931年7月創辦《南星雜誌》，以文藝作品及時事政論為主，兼有天主教相關文章。1933年9月，張若伯回海豐省親，於25日在縣城被當地警衛隊扣留，翌日凌晨被槍決，罪名為“共匪”，但其友人否認。^⑤

從《南星雜誌》創刊號開始，南華藥房就在那裏賣廣告，之後柯麟又在雜誌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這些廣告留下柯麟在港行醫生活的吉光片羽，而文章則透露出柯麟的政治和醫學觀點。

《南星雜誌》於1931年7月15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9月社長兼主編張若伯去世，1933年11月10日出版由友人代編的第二卷第八期後停刊，現存13期（其中第二

^①關於五洲藥房的研究，參看項隆周：〈記上海五洲藥房的創設和發展〉，《中國藥學雜誌》（北京），第8期，1984年，頁44-46；項隆周：〈舊中國一家先行的製藥企業〉，《中國藥學雜誌》（北京），第3期，1987年，頁185-89。上海市醫藥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上海近代西藥行業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頁258-73。

^②〈商界小新聞〉，《民國日報》（上海），1928年8月14日，版2。

^③柯麟：〈李碩勳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戰鬥〉，《革命史資料》編輯部主編：《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27。

^④廢名：〈張若伯小史〉，《南星雜誌》（香港），第8期，1933年，頁1-2。

^⑤佚名：〈中國人命賤〉，《南星雜誌》（香港），第8期，1933年，頁42；味增德：〈假如張若伯是共產黨〉，《南星雜誌》（香港），第8期，1933年，頁51-52。據莫世祥研究，1927年秋冬，國民黨調集重兵圍剿海陸豐地區的起義軍，不少起義軍人員撤退至港澳。莫世祥：《中共革命在香港（1920-1949）》，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頁76。張若伯是否海陸豐地區起義軍之一，或是否中共地下黨員，有待查證。

卷第三、四期為合刊)。^①南華藥房在《南星雜誌》上的廣告，以及柯麟文章發表的情況大致如下：

1) 第一卷第一至四期，四分一版小廣告，內容為“深水埔，南華藥行，專辦世界著名花柳，肺癆，白濁各種聖藥，價格克己！”

2) 第一卷第五、七期，廣告佔位縮小，但內容改為“深水埔荔枝角道九十五號南華藥房，專辦應驗中西良藥兼常駐男女醫師接生應診非常便利，醫師柯麟啟”。同時，第七期的〈編輯餘譚〉預告：“自下期起，特闢‘醫學叢談’一欄，並請柯麟醫學士為主編，讀者如有關於醫學著作見惠或詢問，深表歡迎！”^②可惜現時第八期沒有傳世，從介紹來看，其應是醫學普及文章及衛生問答之類的內容。現存的第十期也不見有此專欄，故有可能“醫學叢談”專欄只辦了一期。

3) 第一卷第十期沒有南華藥房的廣告，但刊出柯麟署名的〈霍亂正在中國流行的原因及預防〉專文。

4) 現時看不到第一卷第十期後的三期《南星雜誌》，接下來的是1932年10月30日出版的《南星雜誌》第二卷第二期，在封底廣告頁面上，有一欄“醫界消息”，刊登“一、介紹深水埔南華藥房柯麟醫師”，“二、澳門籌備中之南華醫社”。由於不見前三期《南星雜誌》，故不知這一醫界消息何時開始刊登，但同一內容的醫界消息在接下來的幾期雜誌內均有刊出，直到1933年5月30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六期為止。1933年8月20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七期，同樣的醫界消息廣告，只有“介紹深水埔南華藥房柯麟醫師”，介紹人也由原來的九個變為六個。^③同年11月10日出版第二卷第八期是《南星雜誌》最後一期，醫界消息廣告也是同一條，介紹人則因雜誌主編張若伯已去世而剩下五人。此期間，柯麟在雜誌的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發表〈青年與衛生〉一文，此後不見有其署名的文章。

可能因為同鄉關係，柯麟與張若伯認識，所以從《南星雜誌》第一期起就在該刊賣南華藥房(行)的廣告作支持。隨着認識日深，柯麟還幫忙主持醫療欄目，進而為之撰寫專文；南華藥房在該刊的廣告內容也更詳盡多元，最後以醫界消息的形式推介柯麟醫師及介紹其醫務發展。

從第一卷第五、七兩期的廣告內容可見，柯麟此名是他到香港後取的，此前在上海曾用名柯達文，做醫師註冊時用原名柯輝萼。此外，廣告刊出南華藥房的具體地址是“深水埔荔枝角道九十五號”；而“常駐男女醫師接生應診”，是指柯麟與其夫人陳智英，陳智英是護士，當時應從事接生工作。

第二卷第二期開始的醫界消息廣告，進一步提供柯麟在港行醫鱗爪。其第一條是“介紹深水埔南華藥房柯麟醫師”：

^① 本文《南星雜誌》資料來源於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

^② 〈編輯餘譚〉，《南星雜誌》(香港)，第7期，1932年，頁23。

^③ 內文刪去“對於花柳白濁內傷咳血尤其特長”此句。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士國民政府衛生部註冊醫師

柯麟先生。學識淵深。經驗豐富。醫治男女各科無不手到回春。對於花柳白濁內傷咳血尤其特長。昔日在上海縣壺。早已譽騰眾口。來港而後。開設南華藥房於深水埔荔枝角道。賣藥醫人。濟人尤眾。洵當代之扁鵲。再世之韓康也。謹綴數言。以為介紹。

介紹人

徐維錦 鍾景棠 陳伯華

鍾秀南 何逸農 張若伯

馬育航 何華表 魏蘊輝

九位介紹人，大都是海豐籍的軍政名人或曾在海豐工作人士，^①包括有《南星雜誌》社長張若伯、作者陳伯華，可見此時柯麟與張若伯已熟絡，由張若伯出面邀集同鄉老友替柯麟的醫務所做宣傳。^②《南星雜誌》上有許多醫療廣告，但由社長署名做介紹人的，只有柯麟一個。

醫界消息第二條是“澳門籌備中之南華醫社”：

中山大學學士。國民政府衛生部註冊醫師。柯麟先生。及其夫人上海同德醫校畢業生陳智英女士。自去年由滬回港。開設南華藥房於深水埔。雖格於港例。未便懸壺。惟親朋戚友。聞名登門求診者。絡繹不絕。無不著手成春。口碑載道。近為利便澳門同胞之就診起見。更與新從日本回國曾任上海國民醫院院長陳炎冰醫學士。在澳門特設南華醫社。業已租定營地大街中山書店二樓為醫務所。積極籌備佈置。並向外洋定購太陽燈。電療機及新式醫治梅毒內科等器械。規模甚為完備。一俟佈置就緒。即可開幕云云。

這則廣告的柯麟行醫資料非常珍貴。廣告中不僅介紹柯麟，連其夫人陳智英也提及，這是柯麟報刊醫療廣告中僅見，可知其時柯麟是“夫妻檔”開業。廣告又說“自去年由滬回港開設南華藥房”，去年是指1931年，因柯麟於1930年12月底才到港，1931年南華藥房開張，時間吻合。廣告說“雖格於港例，未便懸壺”，這是因為港英政府嚴禁未經在港註

^①這些人當中，馬育航、鍾秀南、鍾景棠（鍾秀南之兄）等人均與陳炯明有密切關係，1906年曾共組“正氣社”，1908年又秘密結盟從事革命活動，又一直追隨陳氏。參見陳定炎編著：《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上），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頁4-6；馬思周：〈馬育航生平及其子女馬思聰十兄妹〉，汕尾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汕尾文史》（第16輯），汕尾：汕尾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頁99-108；莫春香、黃廣蓬：〈鍾秀南盜款引渡案〉，政協廣東省海豐縣委員會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海豐文史》（第25輯），海豐：政協廣東省海豐縣委員會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2006年，頁55-60。

^②魏蘊輝是天主教神父，曾到海豐汕尾傳教。見 archives.catholic.org.hk/Online%20Exhibition/CCSWHK/PRI/P-NGAI%20WF.pdf。張伯若是天主教徒，魏蘊輝應是由張伯若邀請署名做介紹人的。

冊的西醫執業，不承認內地的醫生文憑，但對中醫沒有限制，^①所以許多內地到港華人西醫只能以中醫名義行醫。柯麟後來回憶也說開辦南華藥房，“同時還掛出中醫醫生招牌。我天天忙於醫人”。^②柯麟說“天天忙於醫人”，從廣告中“登門求診者絡繹不絕”可以證實。

這個廣告最珍貴之處，是記載柯麟其時已跟陳炎冰合作，“租定（澳門）營地大街中山書店二樓”開設南華醫社。這一期《南星雜誌》在1932年10月30日出版，即柯麟在此前已有移居澳門的打算。陳炎冰原名陳士元，是柯麟在廣東公醫的同學，曾參加由柯麟等人發起的要求撤換公醫教授鄧真德的罷課運動，^③可見兩人非但是舊識，而且理念相近。廣告內容連陳炎冰學歷、醫所名稱、地址、擬購設備等等資料都詳細列明，顯然是由柯麟提供的。要注意的是，醫所叫南華醫社，不是“藥房”，乃因為澳葡政府不像港英般對華人西醫執業有嚴格限制，可以公開行醫，毋需以藥房做招牌。

柯麟他們似乎不單在《南星雜誌》為南華醫社做廣告，也在別的地方做宣傳。現存一份“介紹良醫”廣告，附在陳炎冰1933年著作的《游泳與醫學》中出版。廣告介紹黃鼎臣、陳炎冰、柯麟三個醫生，內容謂“黃陳柯三醫學士，醫理淵博，經驗尤富，在東京滬港行醫多年，活人無算，弟等知之有素。現當三醫師在澳創設南華醫社之始，用特介紹，俾患者知所問津”。署名的介紹人有15個，包括馮康候、范潔朋、徐佩之、李際唐、鄒魯等穗港澳紳商學界名人，^④還有鍾秀南、鍾景棠、陳伯華、馬育航等四人，^⑤此四人也列名《南星雜誌》上推介柯麟醫師的介紹人。由此廣告可知澳門南華醫社後來加入了黃鼎臣醫生。^⑥《南星雜誌》在澳門有發售，^⑦也有澳門醫生在該刊刊登廣告，^⑧故柯麟他們在雜誌上預早宣傳，以便澳門讀者知悉。這份“澳門籌備中之南華醫社”廣告，從1932年10月30日第二卷第二期刊登到1933年5月30日第二卷第六期為止，8月20日的第二卷第七期已不見，則澳門南華醫社應在1933年6月初開業。陳炎冰著作的《游泳與醫學》（非賣品）

^①港英政府在1884年頒佈《醫藥登記條例》，規定西醫必須進行登記，但其第三條指定中醫不受該條例限制，參看魯言：〈香港早期的中醫地位〉，《香港掌故》（第三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年，頁91-92。港英政府不承認中醫資格，但亦不干涉中醫治療，直至回歸前依然如此，參看李沛良：〈中醫藥傳統在香港的發展和應用〉，邢慕寰、金耀基主編：《香港之發展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07-29；劉小斌、鄭洪、靳士英：《嶺南醫學史》（下），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10年，頁463；謝永光：〈香港中醫藥百年滄桑〉，《中華醫史雜誌》（北京），第3期，1997年，頁129。

^②柯麟：〈李碩勳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戰鬥〉，《革命史資料》編輯部主編：《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頁27。

^③陳志文：〈大革命時期的廣州學生運動〉，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主編：《廣東青年運動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74。

^④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頁221。

^⑤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頁220-21。

^⑥黃鼎臣也是海豐人，1927年在日本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期間積極參加當地革命活動。1928年因在東京參與組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大同盟”而遭日本警察拘捕，遣返上海。同年10月又因組織反帝大同盟，遭入獄囚禁，到1932年底才出獄，1933年輾轉來澳行醫。詳見黃超：〈黃鼎臣的一生〉，政協廣東省海豐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主編：《海豐文史》（第14輯），海豐：政協廣東省海豐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5年，頁48-79。

^⑦據雜誌第一卷第七期〈分銷處一覽表〉，澳門的分銷處是“真原學校”。廣告頁，無頁碼。

^⑧如第一卷第十期有澳門國醫葉霖清、葉榮棠、潘炳坤；第二卷第二期有國醫葉榮棠、麥達雲醫所及趙悅文女醫生（按，應是夫婦）。麥達雲後任鏡湖醫院西醫主任。廣告頁，無頁碼。

於 1933 年 6 月 15 日在澳門付印，版權頁上發行者為“澳門大街八十二號南華醫社”，^①大街即營地大街，即前述《南星雜誌》提及的地址。此兩項資料可以互相印證。同時，該年 9 月 15 日，陳炎冰擔任鏡湖醫院救傷隊義務教員，^②可見其時陳已在澳門。

南華醫社從 1932 年 10 月前開始籌備，到 1933 年 6 月初開張，柯麟那時已有意移居澳門，否則《游泳與醫學》所附介紹良醫廣告上不會有柯麟名字。然而，從目前資料來看，柯麟最後應該作罷，留在香港，沒有過來澳門，此從 1933 年 11 月出版的最後一期《南星雜誌》仍然保留“介紹深水埔南華藥房柯麟醫師”廣告可見。柯麟留港原因待考。柯麟打算移居澳門，或許跟 1932 年 3 月起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組織被叛徒出賣破壞有關。^③

除了在《南星雜誌》幫南華藥房賣廣告外，柯麟也在雜誌上發表了兩篇署名文章。在第一篇〈霍亂正在中國流行的原因及預防〉中，柯麟痛斥道：

不幸生為中國人，尤其是不幸生在這個外侮內亂，人禍天災，時疫流行的年頭；要希望政府努力於社會衛生的設備，來為大眾謀利益，這正如窮小想得一架福特車一杯柯柯（原文如此，衍字，應為“樣”字）地只是夢想的了，因為中國統治階級的人們，他們只要自己的腹能便便腫脹，誰個還有良心顧及百姓們的疾病死亡呢？^④

柯麟在文中詳細介紹霍亂的病原、傳染媒介、預防方法，希望在政府不顧時，大眾能有個衛生認識來自救。此文可見柯麟對統治階級自顧享樂、漠視民瘼的憤懣，對廣大國人衛生利益的關心。張若伯在同期〈編後瑣話〉指出柯麟此文“不但消極的教我們如何預防，且指示給我們一條積極的根本的去消滅霍亂症的路線！所謂瘟神疫鬼，不是冥冥中的人物，是在朝的達官貴人，這微意，我們是不可不知呵”。^⑤張若伯顯然也讀出柯麟文中的微言大意，且進一步將“積極的根本的去消滅霍亂症的路線”與“在朝的達官貴人”聯繫起來，暗示消滅霍亂的根本之道就是消滅後者。

第二篇〈青年與衛生〉，洋洋近萬言，文中柯麟同樣詳細地講解了青年要注意的衛生諸問題。不過，在進入正題前，柯麟先花一些篇幅批評“傳統死生說”，並且同樣猛力抨擊統治者的逞慾無道：

^① 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 年，頁 220。

^② 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 年，頁 215。

^③ 1932 年 3 月，由於省委常委、省委駐香港特派員廖亦通被捕後叛變，在港兩廣省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多名領導被捕。同年 12 月上旬，省委書記潘洪波被捕叛變，導致省委主要負責人等 20 多人被捕。見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等主編：《中國共產黨廣東省組織史資料》（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 年，頁 177-78 及 183。關於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組織情況的變遷，參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2011 年，頁 127-32；莫世祥：《中共革命在香港（1920-1949）》，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 年，頁 75-101。

^④ 柯麟：〈霍亂正在中國流行的原因及預防〉，《南星雜誌》（香港），第 10 期，1932 年，頁 12。

^⑤ 〈編後瑣話〉，《南星雜誌》（香港），第 10 期，1932 年，頁 18。

中國的政府，從來就不注意衛生的事業，而中國的人民，又固奉著“死生由命”的傳統迷信說，前者既汲汲於爬錢，他們除了盡量搜括而外，還製造了些害人的病菌。他們為了滿足他們的獸慾，他們當然樂意人民變成呆笨的“豬仔”的，因為人民變成了“豬仔”他們便可大逞其淫慾的掠奪了。於是他們在教育方面不使人民明白真正有用的常識，而在信仰方面更使人民的迷信植得根深蒂固。

因為政府的不負責任，人民的固奉迷信，於是影響及於科學的不能進展尤其是醫學的不能進展，中國的醫學家既拘執於數千年來傳統的見解，而他們又反對科學的精神，他們只知死守著幾句死板法言，全不知改造與推進醫學發展的努力，產生在幾千年前的醫術，到現在依然像新發明似的被應用著。他們一樣相信“死生由命”的舊說，認為醫術對於病人的功用只是偶然運氣的成就吧了！這樣中國的人民，中國的青年，因疾病而死亡而廢絕的也只好茫茫昧昧作為命運的犧牲者了。^①

像所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賢一樣，柯麟對傳統中醫是持反對意見的，尤其他是個西醫，在當時的時空是不會認同中醫的。不過，他把中國醫學的不能進展，歸因為政府不負責任及人民固奉迷信，把醫療進步與政府責任聯繫起來，表現出鮮明的現代公民意識。

從這兩篇文章可見，柯麟嫉惡如仇，對當權者的批判不假辭色，金剛怒目；與此同時，對普羅大眾尤其是青年人，卻哀其不幸，苦口婆心地寫作長文，詳細講解衛生知識，直似菩薩低眉。這種愛憎分明、不畏強權、關心底層的人道精神，在柯麟移居澳門後依然不改本色。

三、柯麟初到澳門的社會活動

關於柯麟到澳門的時間，現時一般都說是1935年秋。^②柯麟自己的記述則有兩個版本：一、在〈回憶彭湃〉中，柯麟提到“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在香港期間”（這是1935年說）；^③二、在另一篇〈參加革命運動的回憶〉中，柯麟則說“1936年間，香港政府搜查了我們藥房兩次，為免遭破壞，我把南華藥房交弟弟柯正平管理，我到澳門開設南華醫社”（這是1936年說）。^④這兩篇回憶錄都記錄於1970年代末，當時柯麟已年近80歲，記憶出錯不奇怪；當然，亦有可能是訪談整理者的原因。

柯麟應該是1936年到澳門的。1937年11月《華僑報》有一則“介紹澳門名醫柯麟醫師”的廣告：

^①柯麟：〈青年與衛生〉，《南星雜誌》（香港），第3、4期（合刊），1933年，頁28-29。

^②魯陽、卓大宏、南草、梁芝瑗：《柯麟傳》，澳門：澳門國際名家出版社，1993年，頁97。吳培娟、柯征、吳潤生、姚豐、吳偉樂等主編：《丹心照鏡湖：柯麟院長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特刊》，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頁18。

^③柯麟：〈回憶彭湃〉，劉林松、蔡洛主編：《回憶彭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16。

^④柯麟：〈參加革命運動的回憶〉，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廣東黨史資料》（第21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8。

柯醫師為吾粵海豐縣人，品學兼優，手術尤佳，在澳懸壺年餘，訂症精審，活人無算，誠不愧良醫之名也。館設澳門板障廟前南華醫社，附設留產所，成績斐然。徐佩之、何仲恭謹啟。^①

這是現有文獻可考的柯麟來澳時間記載。1936年10月11日鏡湖醫院值理常會記錄，因黃鼎臣醫生返回廣州，^②改聘柯麟醫生出任護士學校義務教師。^③這是鏡湖醫院現存關於柯麟的最早記錄，時間與上述1937年11月廣告“在澳懸壺年餘”相符。根據這些線索，可以推測柯麟大約於1936年6-9月間來澳。

柯麟在澳門的診所雖然仍叫南華醫社，但已由營地大街搬遷到鄰近的板障（樟）廟前（即板樟堂前地），^④而且附設留產所，由其夫人陳智英主持。

柯麟到澳後，就活躍在各項社會事務上，^⑤尤其熱心參與醫療相關的義務活動。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戰軍興，全澳同胞熱心支持抗日事業。當年10月，澳門商會兼鏡湖值理會主席徐偉卿倡議成立“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培養到戰地服務的救傷隊，柯麟與高伯英、郭尚賢等多位醫生義務出任導師，又兼任訓練部長，負責“計劃訓練大綱，聘請經驗醫師，分配訓練課程，教授救護學識，考查救護隊員之技能等事項”，^⑥基本就是課程主任一樣。青年救護隊一連辦了兩期，^⑦都是由柯麟負責訓練事務。^⑧

柯麟此時可能藉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的創辦，暗中進行中共地下組織工作。1949年11月6日，在廣州宣佈解放，廣東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柯麟在澳門召開記者會，正式公開一個地下組織“澳門華僑協會”，支持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柯麟這樣介紹這個組織：

本會是一個歷史頗為長久的團體。抗戰初期，各地來澳的進步人士，為數頗多，教育界，新聞界，藝術界的也很不少，彼此都覺得，有一分精神，就要做一分事，有一點力量，就為祖國效一點力，才不辜負僑居的時光，……我們覺得組織一個包括華僑各行業各職業人士的統一機構，實有必要，於是就產生了華僑協會的這個組織。這個組織，可以說是一個不分性別，不分階級，不分職業，不分地區，為僑胞福利求進步的大聯合的團體。在這個時候，我們團結了一部份僑胞，參加祖國的抗日神聖戰爭，也是我們組織青年救護團，參加救護，醫藥，宣傳，教育等各種事業，和各種慈善救濟事項。^⑨

^① 〈介紹澳門名醫柯麟醫師〉，《華僑報》（澳門），1937年11月21日，版3。

^② 柯麟於其時來澳，會否是當時中共組織安排來接替黃鼎臣在澳工作，尚待資料考證。

^③ 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頁224。

^④ 據1938年3月刊登在《華僑報》上的廣告，南華醫社地址為“板樟廟前地十號二樓”。見《華僑報》（澳門），1938年3月9日，版3。

^⑤ 比如於1937年12月，著名婦女運動領袖史良來澳訪問演講，柯麟便參與陪同接待。見〈史良先生昨晚參觀本報〉，《華僑報》（澳門），1937年12月22日，版2。

^⑥ 廖澤雲主編：《鏡湖春秋：文物集》II，澳門：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2011年，頁275。

^⑦ 〈昨舉行始業禮〉，《華僑報》（澳門），1938年7月18日，版2。

^⑧ 1938年3月，岐關職工救護隊成立，又是邀請郭尚賢、柯麟負責訓練。見〈今日行開學禮〉，《華僑報》（澳門），1938年3月21日，版2。

^⑨ 〈柯麟醫生演述組織和工作經過〉，《華僑報》，1949年11月7日，版4。

據此，有理由相信“澳門華僑協會”可能是中共在澳門的地下機關或外圍組織，而且在抗戰初期就開始秘密參與澳門各項社會公益及慈善救濟活動。

1940年3月，中山各地逃難民眾蜂擁而至，澳門各處擠滿難民，全澳華人社團聯合成立“閩澳華僑濟難會”（後奉澳督命改稱“振濟會”^①），共商救濟辦法。柯麟也積極投身其中，^②到難民收容所義務治療，又幫忙種痘。^③澳門學生救濟會收容逃難到澳的學生，柯麟出任他們義務醫師，親到收容所為學生診治，又出資購買藥物送給病者服食。^④此後，學生一有病情，就分送柯麟及另一醫師劉振權的診所。^⑤由於柯麟等醫師對逃難學生無微不至的照顧，1941年4月澳門學生救濟會繼續聘請柯麟和劉振權出任義務醫師，更特意送匾致謝。^⑥1942年5月，柯麟又義務出任天主教濟貧會組織“兒托所”醫師。^⑦總之，在全澳各界傾力合作賑濟難民、共赴國難的大義下，柯麟積極參與救死扶傷，表現出醫者的大愛精神。

當然，在柯麟眾多的社會關係中，以在鏡湖醫院的服務最為重要。1936年10月，柯麟到澳不久，便已接替黃鼎臣出任鏡湖醫院護士學校的義務教師，但具體的任教情況，目前尚不清楚。到1940年6月，鏡湖組織西醫顧問團，柯麟為顧問之一，協助制定顧問團章程。^⑧1941年王德光、黃耀堅兩位醫生加入值理會後，大力推動鏡湖往現代化方向轉型，柯麟作為顧問之一，在背後出謀劃策。1943年2月，柯麟跟吳鳴兩位醫生由澳督戴思樂（Gabriel Mauricio Teixeira）推薦，加入鏡湖值理會，正式進入鏡湖決策層，開始革新鏡湖的歷程。

在澳門定居下來，進入鏡湖醫院工作，使柯麟這位沉潛的中共地下黨員，^⑨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環繞下，找到一處施展才華的機會，由此走上歷史前台。從柯麟在香港發表的文章及在澳門熱心社會參與的表現來看，柯麟在“孤島”時期的澳門發光發熱，既是歷史給予的機遇，也是熱愛國家民族、關心普羅大眾疾苦的大愛醫者性格決定的必然。

① 〈改名振濟會〉，《華僑報》（澳門），1940年3月15日，版5。

② 〈成立閩澳華僑濟難會〉，《華僑報》（澳門），1940年3月10日，版5。

③ 〈改名振濟會〉，《華僑報》（澳門），1940年3月15日，版5。

④ 〈逃澳難生〉，《華僑報》（澳門），1940年4月4日，版5。

⑤ 〈關懷難生〉，《華僑報》（澳門），1940年4月18日，版5。

⑥ 〈擴大學救事工〉，《華僑報》（澳門），1941年4月27日，版5。

⑦ 〈兒托所積極工作〉，《華僑報》（澳門），1942年5月12日，版3。

⑧ 〈西醫顧問團〉，《華僑報》（澳門），1940年11月18日，版5。

⑨ 柯麟與廣東地方黨組織的關係，至今未有明確文獻說明。有學者認為，“在廣東黨組織的文件及給中央的報告中，從未提到過柯麟，筆者也未見到柯麟參加澳門地方黨組織活動的材料，柯麟似乎屬於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左雙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5期，1999年，頁54。